

两项国际奖的成就、经验和思考^{*}

胡文康

(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 文中介绍了该所获国际“全球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控制成功业绩奖”的两项研究成果,及申报国际奖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关键词 国际奖,成就,经验,思考

1995 年 6 月 16 日,在第 1 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的前夕,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伊丽莎白·多斯维尔女士亲自将新设的“全球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控制成功业绩奖”的证书两份授予中国获奖单位代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李崇舜研究员,对该所在干旱区防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治理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了最真挚的祝贺。与中国同获此项殊荣的,还有塞内加尔、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纳米比亚等 5 国,获奖项目共 8 项。

我国获奖的两个项目是“策勒流沙治理研究”和“盐碱地、沙地引洪灌溉大面积恢复红柳造林技术”,均由我所主持完成。前一项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这两个项目在全世界报送的 80 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表明中国在荒漠化治理的研究领域已走在了世界前列。

新疆生土所两项成果在国际获奖,在国内引起了轰动。6 月 21 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主持,在乌鲁木齐市召开了隆重的表彰大会,周光召院长发来了贺信,自治区人民政府张云川常务副主席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做出了表彰决定,中国科学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各颁发了 10 万元奖金和后续研究费。新疆分院也做出了表彰决定,并颁发了 2 万元奖金。

我国在荒漠化防治领域荣获国际大奖还是首次。我所研究成果获奖的主要特点是:

首先,治理的规模大。策勒流沙治理,5 年时间治理 1 万公顷;大面积恢复红柳,3 年时间达到 1.8 万公顷(如今已发展到 5.3 万公顷)。这在新疆荒漠治理史上是空前的。

其次,治理的效益好。策勒流沙治理使当地农民收入提高两倍半,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投入产出比达 1:7.5,国际地理联合会干旱区资源分会主席门森教授称赞说:“在人类征服沙漠、沙漠造福人类的道路上,你们做出了让人类完全信服的成绩”。大面积洪灌恢复红柳,在盐碱区减轻了盐碱危害,在流沙区固定了流沙,投入产出比在 1:30 以上,自治区主要领导同志批示:“是为南疆人民办的一件大好事”。

第三,技术成熟、简易,投资少,适应新疆区情。两项成果均利用洪水为灌溉水源,既化害为

^{*} 收稿日期:1995 年 9 月 25 日

利,又避免了与农业争水。利用洪水进行夏季造林,并选择出适宜的固沙植物种,通过了多年试验,确定了适宜推广的技术。策勒流沙治理,每公顷投资 11 元,大面积恢复红柳,每公顷投资也不到 15 元,在经济十分贫困的沙漠地区,完全用得起,推得开。这也是治理上规模的重要原因。

回顾获奖过程,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成果申报过程中,我们的观念要符合国际惯例。

获奖的两项成果,按属性都归类于社会公益型。即服务于社会,为公众产生效益。这在中国和外国都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所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要求说明解决办法、结果和成功的理由。在说明解决办法时,必须回答制订项目时是否与当地人进行协商;是否适合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状况;在何种程度上利用了当地资源;在何种程度上利用了当地或简易的技术等问题。在说明结果时,需回答在何种程度上改进了当地人的福利;是否合乎成本效益;是否对其周围产生影响等问题。在说明成功业绩的理由时,需说明是否有持续性;在其它地区类似情况下是否能重现。问题虽然很多,却简单明了,紧扣了“社会公益”4 个字,一两张纸就能将成果水平、意义和重要性说得清清楚楚。

社会公益项目的国际评奖,特别重视政府行为和群众参与程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领导重视”和“群众支持”,但在内容上具体得多。例如,在政府行为上,十分关注是否列入国家的发展计划、是否给予了投资、是否有效立法、是否有协调机构、是否有切实的推广措施等等,归结起来,即政府重视的具体程度,而不是泛泛的指令和简单的拨款。在群众参与程度上,除一般的群众性的了解外,还特别关注妇女、儿童的参与程度,即参与的普及程度,而且还十分关注群众的受益和受教育程度。这些进一步表明了“社会公益”的具体内容。

我所两项成果能获国际奖,主要原因之一是能实事求是地、较为圆满地回答上述问题。两个项目分别列入自治区重点项目计划和推广项目计划,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直接关心、过问,拨款支持,并组建了相应的机构。当地群众广泛参与,群众接受普及宣传人数在 20 万人以上。两项成果对荒漠化的治理,不仅改善了环境,创造了效益,持续性好,推广性强,而且利用了当地洪水和原生植物,提供了简易有效的技术。因此,它们获得荒漠化防治的国际奖是当之无愧的。

我国现行的评奖办法程序复杂,内容繁多。成果申报表的许多项目还注明:“本页不够可另加页”,其难度有时不亚于做一篇学位论文。然而,却偏偏缺少“政府行为”和“群众参与程度”的考查,在成果的有效性、适用性上令人难以捉摸。现有的应用类成果奖,被冠以“科技进步奖”,应当增加表明其“科技进步”的社会内容。

这次获奖还给我们一个启示:中国的社会公益研究应当怎样选择、立项和给予支持。

社会公益研究,不应脱离社会、远离公众。而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一点。为了立项,在题目上挖空心思,标新立异;在内容上求大、求全、求洋,美其名曰“科学前沿”;在项目主持和实施中,追求“名人效应”,忽视了项目实施地区和群众的参与,因而背离了“社会公益”的实质。这样,出现获国际奖的成果在项目立项时难以进入高层次的计划,重大社会公益项目所在地区主持不了项目等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在 1995 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社会公益研究被放在了重要位置,并被列为“稳住一头”的重要部分,这对改善研究状况,提高研究效益,无疑是一件幸事。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下,中国社会公益研究成果将更多地进入国际奖的受奖行列,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